

浅析陶行知的农民教育思想

李晓荣

(盐城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在倡导乡村教育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农民教育的实践及经验。其中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全民义务教育、物质利益原则和尊重关爱农民等方针对于今天开展农民教育,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对农民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他以识字教育为基础,注重素质教育,并在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注重抗日宣传,教育并引导农民参加抗日救国。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动员小先生、全国的知识分子、农民甚至各个阶层的劳动人民都参与到教育队伍中来,实现教学相长,从而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陶行知;农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D4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8)04-0019-05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振兴,重在教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着“行”而“知”的理念,以亲身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农民教育之路,为当今的农民教育、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一、陶行知农民教育遵循的原则

在探索农民教育的过程中,陶行知认为应遵循的原则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全民义务教育、物质利益原则和尊重关爱农民等内容。

1. 生活即教育原则

针对传统教育中“为教育而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的主张,陶行知倡导“生活即教育”,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在《生活教育之特质》里,他还分析了生活教育的特征:一是生活的,即受过教育的生活与没有受过教育的生活摩擦发生出的火花;二是行动的,知识源于行动,行动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三是大众的,不是为有钱人而办的小众教育,而是大众办的,且服务大

众生活的教育;四是前进的,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教人真正的向前去;五是世界的,教育不能局限于围墙之内,而是开放的,要面向社会、面向中国、面向世界;六是有历史联系的,不仅有历史继承性,且兼备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1]216-218}。

陶行知特别强调了乡村教育一定要结合农民的生活。他批评了传统的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与乡村生活脱离甚远,它教育的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农民,把农民教成书呆子,“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1]99},教人穿衣不种棉、吃饭不种稻;教育还不能使农民自立自强摆脱贫困,使强的变弱,弱的更弱。陶行知认为这种乡村教育是在走向万丈深渊。而出路就在于“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1]99},具体地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这样的教师要有科学的头脑,农夫的身手和改造社会的精神;要有活的方法,即教学合一;要用活的环境,运用环境中的活势力发展学生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让荒山成林、瘠地长五谷;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教育要与农业携手,教

收稿日期:2018-09-1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MLB010);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MLB010);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B-b/2016/01/20);江苏省教育厅项目(2016SJB71001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7SJB1546)

作者简介:李晓荣(1974—),女,陕西三原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农民选种、调肥、预防虫害;教育还要帮助农民推翻高利贷的盘剥,加强与银行的联络;教育要破除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加强与科学机关的联络,等等。以此来发展乡村教育,“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101},如此一来,中国的每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汇聚成民族的新生命。

2. 社会即学校原则

学校即社会,不是指“学校社会化”,挑选几样社会上的东西缩小了搬进学校,这样就禁锢了教育的自由发展,就像将鸟儿关进了笼子。学校即社会,在陶行知看来是指教学合一,就是要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大的学校,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在教育中了解并适应社会的需求;反对老师教死书,学生读死书,主张问题在生活里发现,问题在生活里研究,在生活里解决。他还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比如在教育场所的选择上,可以利用家庭、庙宇、戏台、茶馆、亭子间甚至厕所等场地。他甚至提出,坟墓都可以作为教育资源,“谁能说庙行的无名英雄墓和古北口的‘支那’勇士墓不是我们最好的课堂啊?”^{[2]169}还有,若无房间,树荫也行;大型集会可以露天举行,以天地为礼堂,在这里,农民举行讨论会和群众大会,叙述自己的故事,高唱自己的歌曲,学习朴素的道理,讨论国家和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小情。在《教育的新生》中,他进一步指出,社会是一所伟大无比的、特殊的学校,这所学校“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3]110},在这所学校里,人人都是老师,人人都是学生,人人都是同学。不了解社会的需求,教育就无的放矢,流于盲目;不运用社会的力量,教育就失去力量,软弱无能。

这种教育是运用社会的力量,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即学校,还包括教育内容的社会化。例如,陶行知建议将民族解放运动与教育相结合。他举了个例子,算术本来是纯粹的学科,但如果在讲授的过程中将中国因殖民侵略而失去的领土资源等数量联系起来,那么,不仅教会了学生纯学科知识,还宣传了民族自救精神。

3. 普及教育原则

在旧中国,金钱是横亘在民众与知识之间的一座大山,很多农民因为贫困无法接受教育。因此,办免费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机会就成了陶行知在农村普及大众教育的重要原则。他认

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花最少的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广普及全民义务教育。针对有些教师想通过收学费或入学考试的方式来减少入学人数的做法,陶行知批评了这一行径,认为若推行了这一做法,将会使教育重新返回到大众难以接触到的精英教育中去,而且,“整个人民教育运动的目的就将失败”^{[4]745}。他还提出,针对忙碌的农民要“免费送教上门”,使那些不能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如家庭妇女、放牛娃等人既能接受到教育,同时又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从而将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众生,洗荡于乾坤,弥漫于宇宙,人人得以自由呼吸、自由享受。也就是说,摒弃旧时将教育当作商品出售的弊端,使“教育变成人人可免费获得的一种礼物”^{[4]748}。在《关于香港教育问题的谈话》中,他批评那种纯粹收费的教育,认为如果认为教育纯粹的是赚钱为目的,更是认为收了费之后就万事大吉,什么事也不管不问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是“无可宽恕”^{[4]762}的。

在《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中,他还探讨了如何能使免费的大众教育走得更深更远。比如,他建议要在全中国各县乡村市镇免费播放影片来提高农民的素质,为此需要设立中央科学电影制造局来研究影片、发电机和放映机;要用无线电广播来教育农民,为此,就需要研究收音机的中央无线电收音机制造局,然后免费分送给全国各县乡村市镇教育场所使用;尽量利用现有的设备和场所如祠堂、庙宇、会馆等地来开展教学;因为灯油很贵,为了节约教育成本,要充分利用日光,不必要时应避免运用灯光。

为了节约教育成本,他还倡导以“新文字”代替“方块字”,也就是用简体字代替繁体字。他还算了大众学习新文字的成本只要三四分钱,“连一个人力车夫也能出得起”,且所耗时间短,学会了就可以读书看报。

4. 物质利益原则

教育要兼顾受教育者的物质利益,否则容易沦为空谈。毛泽东曾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5]467}。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要与关心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改善农民生活、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才会有说服力。在教育实践中,他也是这么身体力行的。1933年,由他倡导的“山海实验乡村学校”成立后,第一件事不是教育农民,而是设立诊疗所,聘请著名的医生担任医学指导,免费为农民服

务;为了便于农民养鱼生利,帮助疏通、扩宽了四个池塘;为了农民走路方便,牵头修筑了全长548米、通往沪太路的大路。为了提高棉花的产量,他提出要办种棉花的教育,成立了棉花工学团,组织农民参观棉花试验田,引进优良棉种,介绍改散播为条播的好处。他还募捐来条播机,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卷高裤腿,冒着酷暑在前面拉条播机。耐心地教农民怎么推、怎么拉,条头要隔多少距离。1934年夏,遭遇大旱,绝望的农民天天向龙王祈雨。陶行知带领着师生在各个村庄宣传抗旱,却无人理睬。于是他到处奔走筹款买了两台抽水机,帮助农民灌溉庄稼。他就是这样,将乡村教育与农民生活密切结合,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引导而不强迫,使农民乐于接受。另外,在他倡导举办的工学团里,学生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农业劳动,每个月还可以得到一定的补贴,这样的学校从农民的需要出发,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

5. 尊重关爱原则

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相互影响的,对受教育者的尊重和关爱不仅可以提升教育者的亲和力,还能为教育的有效进行创造良好的条件。陶行知在推行乡村教育中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尊重关爱农民不仅能够增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信任和亲近感,还能提高农民对于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和感悟。从一个小故事就能看出来:陶行知推行乡村教育时编的《平民千字课》一直广受好评,有一天,一个女房东给他提意见,说该书第一课所教的“青菜豆腐汤”不吉利,建议修改。原来当地风俗习惯中死了人要吃豆腐羹饭,所以房东忌讳。虽是封建迷信,但陶行知马上入乡随俗,将书里的“青菜豆腐汤”改成“青菜萝卜汤”。陶行知认为乡村教师要尊重农民、关爱农民,要有一颗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心,树立扎根农村、改造农村的信念,因此,乡村教师要具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大脑及改造社会的精神。要拥有农夫的身手,乡村教师就要深入乡村社会,像农民那样能劳动、能吃苦、能实干,了解农民的艰难困苦,并与农民交朋友;要有科学的头脑,在乡村社会推广应用科学技术,传授农业科学知识;拥有改造社会的精神,经济上为农业生产服务,文化上输入文明理念、启迪乡民智慧,政治上传播民主思想、参与农村治理,从而使乡村教师真正成为“改造乡村的灵魂”。

二、陶行知农民教育的重点内容

识字教育、素质教育和抗日宣传是陶行知乡村教育的主要内容。

1. 识字教育

在所有的教育中,识字教育是首当其冲、最关键的教育。如在《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里,陶行知指出,民众要达到普遍识字,普遍扫除文盲的程度才能实现整个生活的现代化。为了引发农民群众对于识字的兴趣,就要教农民唱歌,教他们认识歌里的文字。为了提高识字水平,还要用白话文写的、受大众欢迎的、价钱便宜的刊物,向农民灌输现代知识,培育其先进思想。还要设立大众的流通图书馆:一街一个,一村一个,一镇一个。不识字的借画书给他们看;识字的借文字版的给他们看。借书时不要保证金,只要介绍人,使成千上万的大众能够继续不断地加入读书的队伍里来。为了避免民众对于知识的消极拒绝,提高识字教育的成效,陶行知还提出了“文字教育应预令强迫”的思想,具体做法是:要求小学生、说书人、影院广告、警察等人群宣传识字的要求;识字的警察站在城门口等地抽检行人,不识字的要罚款;对于那些婆婆不许媳妇读书、老板不让伙计上学等妨碍识字教育的障碍,要颁布法律,定其为“妨碍进步罪”,对其处以罚款甚至有期徒刑予以惩戒。

2. 素质教育

在教育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其综合素质。一是知情意教育。他认为知识教育与感情教育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具体地说,知识教育的过程不是用灌输的方式来向农民传授死的知识,而是要用各种鲜活生动的方式来引发受教育者的兴趣和学习的热情;情感教育要能调节并启发农民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等应有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从而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知情意教育能够启发自觉,使受教育者的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二是智仁勇教育。智仁勇曾被认为是“天下之达德”,是个人完满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抗日战争时期正值民族危亡的时刻,更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个人,因此学校要以智仁勇为目标教育学生,所有课程的设置和学生生活的安排也都要以达到智仁勇为目的,从而使学生不仅拥有智慧,还要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切期待,激发他们服务

社会及为了民族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

3. 抗日宣传教育

陶行知不是为了教育而教育,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启发民智,宣扬抗日救国思想。正如他在《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中指出的,“培养难童中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今天育才学校的儿童必过战时的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在《关于香港教育问题的谈话》中,他提到关于教育内容方面应涉及时事政治的方面,认为最低限度每周应该有一次关于时事问题的解释说明。在这样的教育之下,使得青年人明白时事,意识到祖国对他们的期望,从而奋发图强,抓住青春的大好时光学习科学知识,毕业后为祖国做贡献。

三、农民教育的队伍建设

在陶行知看来,小先生、全国识字的成人、全国的知识分子、农民甚至各个阶层的劳动人民只要有点知识或者实践经验,都可以当老师,将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别人,从而加入教育队伍,成为一名教育者。

1. 小先生

“小先生”是指由儿童向别人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有感于旧中国文盲众多,文化落后,教育中师资极端匮乏,提出让儿童一边当学生,一边当“先生”,“即知即传人”,把学到的知识随时传授给亲朋好友,也叫“连环教学法”。小先生运动在农村的推广解决了农村教育中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和女子教育等问题。尤其是在女子教育方面,封建传统中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受到教育的机会很少。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立法制度下,成年男教师不易接触女学员,而女性教师的人数又非常之少。小先生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是这些女性的家人或邻居,能够与她们亲密接触;他们的身份是小孩,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教学,且能够送教上门,让家庭妇女等不能上正规学校的人受到教育,而又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不论早晚,家庭主妇什么时候有空,便什么时候给她们上课。如果家庭主妇还没有把碗洗完,她还可以叫小朋友稍等一会。这一教育方式的出现,不仅推广普及了大众教育,还体现了民众智慧,因为这是工农群众自己找到一条救学校、救国家的方法。小先生的存在,不仅是教农民文化

知识,而且还启发民智,对农民进行抗日爱国精神教育。例如由江苏淮安市的新安小学的学生组成的旅行团,带着唱片、无线电收音机、新闻片等道具,走遍全国 22 个省市,行程 5 万多里,通过演讲、演出、放电影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使民族斗争深入到亿万人民心中。另外,陶行知也指出了小先生制可能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过分的繁重工作可能会影响到小先生们的身体健康,并进而影响“小先生运动”的发展;二是小先生制度有可能会被某些政客所利用,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

2. 全国的识字成人

动员全国识字的人做教师,全民总动员,来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是陶行知推行人民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队伍之所在。他的计划如下:一是全国的学生总动员。当时全国学生人数为 944289 人,若每人能负责两名不能入学的人的脱盲任务,那么全国就可以增加两百万受教育者。二是机关团体中识字的人总动员。那些店铺、工厂、军队、机关等团体中识字的人大约有八千万人,假如其中半数的人每人教两个文盲,那么就会有八千万人脱盲。而且,依据“即知即传人”的原则,被脱盲的人再每人去教一人,脱盲者又会增加四千一百万人。因此,在全国的识字成人的努力之下,全国就有一亿两千三百万人脱盲,“可以向着现代化开步走”。另外,陶行知还提出了“文化网”和“文化细胞”的设想:即由识字的成人和不识字的成人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文化细胞”,共同教学做,活到老做到老,教到老学到老。若将所有的“文化细胞”联结起来,就形成一张扫盲的“文化网”,无论是城里还是乡村,都能将其范围内的人“一齐捞到时代的岸上来,不使一个漏掉。”^{[6]428}这种推动全民教育的思想即便到现在也是十分先进的,对于提升农民素质,提高乡村教育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为了解决因战乱导致的城里先生不敢下乡,致使农村缺乏乡村教师的问题,陶行知提出,要多多培养青年农民识字,由“农人自己负起普及教育之使命”,具体地,可以召集识字的青年农民开办短期的农村改造讲习所,进行国语、算术、卫生、农艺等知识培训,待其学成之后,返乡工作,普及现代生活教育。

3. 全国的知识分子

作为文化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阶层,陶行知具体设计了他们参与农村扫盲的计划安排:人数

为7000的研究员、教授、副教授们每人每年必须在假期中抽出至少十日参与农村改造运动;十万人的大学生和中学教师队伍,每人每年必须在假期中抽出至少十日向前进大众及教师贡献;一百万人的中学学生及小学教师队伍,每人每年必须抽出五日为普及现代生活教育努力。事实上,在山海工学团时期,全国的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曾经是它的教员,如沈钧儒、艾思奇、邹韬奋、沙千里、贺绿汀、聂耳、冼星海、薛暮桥、章乃器、金山、田汉等等都曾来讲学,使学生们学到了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等各种最新知识。

4. 劳动人民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广大的劳动人民虽然理论知识比较匮乏,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陶行知看来,这些经验是丰富的、宝贵的,也是众多师生应该学习的地方。因此,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应成为乡村教育队伍的一部分。1932年,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由于桌椅不够,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木匠开始几天闷着头心无旁骛专心做凳子,陶行知却要请木匠师傅当老师,先教自己和学生们学做凳子。然后再当老师,教木匠学识字,正像他在诗里说的:“先生学木匠,

木匠学先生”。有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好好的书本知识不学,偏要去学当木匠。陶行知作了《手脑相长歌》,告诉大家教、学、做要结合起来,教育要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要在实践中获得真知的道理。不止如此,陶行知还请挖草药的老农去教学生如何辨别草药;请种植花木的花匠来教学生种植花木。

甚至不只是农民,社会上那些有点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在陶行知看来都可以做老师,甚至讨饭的叫花子都有可取之处:在晓庄学校时,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陶行知请了两个叫花子来教学生上生物课,教他们蛇的有关知识,辨认蛇是否有毒,及如何捕捉蛇。没多久之后,学校最胆小的孩子也敢捉蛇了,而且了解了蛇没有脚为什么可以走得快,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等知识。

陶行知先生虽然已故去七十多年,但其对农民教育的理论及实践探索的相关内容,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在当今空心化的农村,留守儿童是否也可以充当一回小先生,教家里的留守老人学知识、学文化,提高其文化素养,排遣其孤独寂寞,使其老有所想,老有所为,等等,如此种种,倘能施行,无论是对于乡村振兴战略,还是中国梦理想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陶行知. 中国教育改造[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2] 陶行知. 陶行知教育名篇[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 [3] 周洪宇. 陶行知教育名论精要(教师读本)[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 [4] 陶行知. 陶行知文集(修订本)[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董宝良.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Tao Xingzhi's Thoughts on Peasant Education

LI Xiaorong

(School of Marxism,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ao Xingzhi accumulated a great deal of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advocating rural education. It contains the principles of life as education, society as school,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all, material interests and respect for and care for farmers. Thes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education of farmer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ng peasants, he laid emphasis on literacy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educating and guiding peasants to participate in anti-Japanese and save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ducational team, he advocates mobilizing young children, intellectual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peasants and even the worki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ucational team,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rural education.

Keywords: Tao Xingzhi; peasant; education

(责任编辑:李 军)